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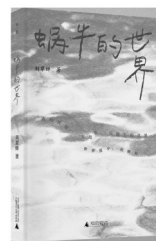
荐书堂

主办单位：济宁晚报 济宁亚龙书城



《种植记忆》

这是一部深刻探讨关于记忆、科技与人性的科幻小说。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女孩陈千色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视力和记忆，她的父亲母亲为了帮助她恢复记忆和视力，采取了一系列治疗方法，并为她引荐了一个名为“小梦”的智能机器人作为陪伴。然而，随着记忆逐渐恢复，千色发现了更多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



《蜗牛的世界》

书中五个散文专辑，集结作者不同阶段的生命切片。一路走来的所失所得，伴着南方岛屿的海风和潮声，拼凑起一个人存在的世界。

“此后，孟楼一带便成为砀山县党的活动中心。1937年9月，孟宪琛携同乡青年赴陕北公学学习，成为陕北公学第一届毕业生。年底，孟宪琛带领十余名进步青年回到砀山，开展救亡运动，出版了《抗统周报》等革命刊物，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到砀山后，建立砀山特支，成立砀山县动委会，都得到了他的大力帮助。孟宪琛的父亲孟昭潜是一位有抗日情怀、受人尊敬的老乡绅，他主动担任砀山三区青年救国团团长，发展了团员八九百人，其母亲和妻子积极参与妇救会，学识字，还为他家活动的党员做饭，其胞弟和堂兄弟好几个都是孟宪琛开展活动的得力助手。全家人还节衣缩食，变卖家产，支持抗战。在孟宪琛一家的影响带动下，当地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孟宪琛全家可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抗日之家’，因为党员干部经常在他家吃饭，他家还被誉为‘抗日饭店’。”

“在砀山县还有一个人对我们帮助也很大，他就是蒋嘉宾，砀山蒋庄人。1926年在南通师范读书时加入共产党。1927年6月回砀山县开展活动，是第一任中共砀山县县委书记，曾经被捕，受不了酷刑，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抗战爆发后，他任国民党第四区区长。他与我党还有感情，多方动员，拉起了一支100多人的抗日武装，要加入我们的队伍。”

王文彬笑着问：“很好啊，你那边现在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吗？”

尹夷僧回答道：“当然有！现在砀山的群众抗日热情十分高涨，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现在把握不准，是我们各自为战，还是抱在一起干，上级党组织有最新的指示吗？”

李贞乾大声说：“太好了，我们都想到一块儿去啦！”

王文彬低沉而坚定地说：“是啊，我们徐西北和鲁西南的几个县都有这种情况，在当地组建游击队，力量小，干不成大事，而且队员思想散漫，总想着回家，不像一支抗日的队伍，我们要把徐西北和鲁西南的抗日力量全部集合起来，搞一次大亮兵，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和

县长们逃跑的时候，在群众心里慌乱的时候，亮出我们共产党的抗日旗帜，给人民以信心，给日寇和国民党以震撼！”

几个人听了，都觉得王文彬的话一下子说到了自己的心里，不由得鼓掌。

郭影秋说：“我们的队伍叫什么好呢？是叫共产党八路军呢，还是叫第五战区动委会的什么部队？”

李贞乾快言快语：“我看还是直接叫八路军痛快！响亮！就叫苏鲁八路军联军好了！”

王文彬沉思了一下，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叫八路军苏鲁联军，不利于团结几个县的国民党左派，像张光中的苏鲁抗日义勇总队之类的名称就很好！”

李公俭说：“对，张光中利用在第五战区李明扬那里弄的苏鲁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的番号，公开在沛县、滕县、峰县发展抗日武装。今年3月，配合李明扬部在湖东作战，开展游击战、破袭战。在台儿庄会战期间，张光中率领义勇队三次袭击津浦铁路日寇驻军。人民群众深受鼓舞，义勇队迅速壮大。李明扬对我义勇队英勇作战深为佩服，大加赞赏。现在，张光中带领这支武装过湖东，在滕峰边、滕县、峰县发展了四个大队，改名叫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

李公俭又转身看看高文甫，问道：“你们单县不是有个第五战区第二游击队司令部吗？能不能用那个番号？”

高文甫连连摆手，生气地说：“那个名头坚决不能用！一是他们的司令没来，那个王须仁只是个代司令，说了不算。关键是用他们的番号，就要让那个王须仁当我们的代司令，会坏了我们的大事！”

王文彬一拍脑门，说：“有了，我们和张光中还是一起的，是同一个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张光中他们可以叫第一总队，我们叫第二总队。现在李宗仁已经跑到大别山去了，第五战区被打散了，这点小事儿也不用跑到别山向他汇报！”

(未完待续)



曲阜碑刻(七十三)

创建孔林围墙记碑

张镔毅

在曲阜孔林这片承载着两千余年儒家文化记忆的土地上，孔林二林门前西花墙内，一块镌刻着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印记的石碑静静矗立。历经几百年风雨洗礼，它的轮廓虽添沧桑，却依旧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气息。此座碑通高1.6米、宽0.67米、厚0.28米，碑身边缘留存着岁月精心雕琢的花边，部分纹饰已在时光侵蚀下略显模糊，却更显古朴雅致。碑面采用正书字体，镌刻二十三行文字，每行五十四字，尽管部分字迹因风化变得难辨，但“起围墙、创门宇、建巡铺”这几个关键字样，仍清晰可辨。这通碑刻既是官方叙事的载体，也是民间生活的镜像，如同打开历史闸门的钥匙般，引领后人探寻明代孔林保护事业与儒家文化传承的过往。

“创建孔林围墙记碑”的碑文，开篇便直截了当地点明了立碑的核心缘由：为保护圣祖林墓，避免周围居民打柴破坏林木，这其中蕴含着三层丰富而深刻的历史信息，为我们揭开了明代孔林保护事业的复杂背景。

其一，孔林作为孔子及其后裔的墓葬群，在明代已被视为“圣祖圣地”，其中关于林木的保护问题已经上升到了文化遗产的高度；其二，当时孔林周边存在“居民打柴”的现实矛盾，反映了圣地保护与民生需求的张力；其三，解决矛盾的方式是“起围墙、创门宇、建巡铺”——围墙划定孔林边界，门宇确立入口，巡铺则驻兵日常管护，形成一套完整的防护体系。

推动这项意义重大的孔林防护工程的关键人

物，是时任曲阜县尹的孔克中。他的身份极具特殊性——既是孔氏族人，又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他在推动工程时，能够天然地实现“宗族势力”与“地方官府”的合作。作为孔氏族人，他对“圣祖林墓”怀有深厚的情感与强烈的守护责任感，推动工程建设是其内心宗族使命感的必然体现；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他拥有调动地方资源、组织实施工程的行政权力，能够将保护孔林的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

据碑文记载，这项防护工程从动议到最终完工，历时整整半年。在半年时间里，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工程共动用工匠三十余人，这些工匠均是当地技艺娴熟的能工巧匠，他们凭借精湛的技艺，确保了围墙、门宇、巡铺的质量；工程所需的石料，全部取自曲阜当地，质地坚硬，适合用于建筑修建，就地取材不仅降低了运输成本，也保证了石料的及时供应；而工程所需的木材，则由曲阜附近的州县协同运送，周边州县积极响应，及时将优质木材输送到施工现场，为工程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

支持。

这种跨区域的协作模式，并非偶然形成，其背后有着强大的政策支撑——永乐帝推行的“崇儒”政策。据《明实录》记载，在永乐年间，朝廷曾先后三次下诏“修葺孔庙林墓”，对儒家圣地的修缮与保护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永乐帝朱棣深知，儒家思想对于维护统治秩序、凝聚社会人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他即位后，不断采取措施尊崇儒家文化，修缮孔庙、孔林便是其中的重要举措。孔克中正是深刻领会了朝廷的“崇儒”意图，积极响应皇帝诏令，成为这一政策在地方上的具体执行者，将朝廷的文化战略转化为保护孔林的实际工程。

如今，我们怀着敬畏之心，站在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石碑前，轻轻抚摸着被风雨磨平的字迹，指尖仿佛能触碰到历史的温度，耳畔仿佛能听到当年立碑者的絮语。那絮语中，或许有孔克中面对孔林安危时的忧虑与牵挂，有他为推动防护工程顺利实施而付出的艰辛努力；还有无数黎民百姓，曾捐赠财物修缮庙宇，希望通过碑刻让自己的善行被后人知晓、被历史铭记。

碑刻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没有夸张的情节渲染，它们只是以最质朴、最真实的方式，记录着历史的片段，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与诉求。它们是历史最本真的模样，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感受明代曲阜地区的社会风貌、文化氛围与人们的精神世界。碑刻本就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典籍，这块“创建孔林围墙记碑”亦等待着我们细细品读、深入挖掘。